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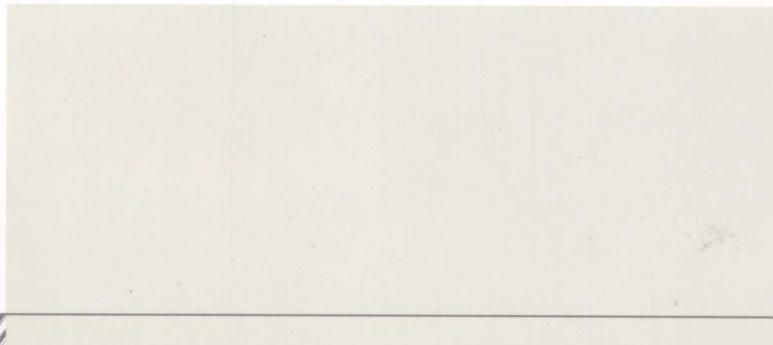


学苑文丛

华夏文明之根探源

晋东南神话、历史、传说与民俗综合考察

刘毓庆 主编



学苑出版社

华夏文明之根探源

晋东南神话、历史、传说与民俗综合考察

刘毓庆 主编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夏文明之根探源：晋东南神话、历史、传说与民俗综合考察/刘毓庆主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 11

ISBN 978 - 7 - 5077 - 3191 - 0

I. 华… II. 刘… III. ①文化史—研究—山西省②风俗习惯—研究—山西省 IV. K292.5 K892.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7709 号

责任编辑：战葆红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编：100079

网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 - 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刷厂：北京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本尺寸：880 × 1230 1/32

印张：17.5

字数：300 千字

版次：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定价：40.00 元

目 录

神农氏发祥于上党考	(1)
晋东南羊头山周边炎帝传说、风俗文化考释	(41)
太行太岳访炎帝	
——太行太岳之野炎帝遗迹与祭祀	(71)
下川文化的生态特点与粟作农业的起源	(99)
太行山地区与粟作农业的起源	(132)
陵川万年岩画考察记	(153)
蚩尤、九黎、三苗与太岳之野	(159)
长子——帝尧的故乡	(201)
山西长子县尧及丹朱遗迹的发现及其意义	(284)
再论商族源于山西漳河流域说	(301)
晋东南及其周边神话与中国文化及文学中之精神	(310)
太行山、太岳山女娲遗迹、传说及其祭拜活动	(344)
长子发鸠山精卫传说及其遗存	(381)
太行太岳中条之野大舜传说与二仙神话的生成	
——太行太岳中条之野二仙神话的考察与研究	(393)

方志对于神话传承的独特意义	
——以山西方志所载羿神话为例 (428)
晋东南成汤崇拜的巫觋文化意蕴考论 (441)
大粮山古战场:长平之战的历史见证与廉颇崇拜	
——晋东南米山小地域文化遗存考论之一 (474)
地方性宗教文化景观与民间信仰	
——晋东南米山小地域文化遗存考论之二 (487)
民间传说遗存:地方性知识与民间记忆	
——晋东南米山小地域文化遗存考论之三 (500)
晋东南明清迎神赛社祭仪及其音乐戏剧 (513)
民间赛社“乐星图”解	
——上党古赛乐艺建构考析 (524)
山西上党戏神类型概说 (546)

神农氏发祥于上党考

刘毓庆

近年在山西省高平市发现了立于明代的“炎帝陵”碑，以及密集的炎帝神农氏的传说，还有立于北齐天保二年（551）的碑刻。这一发现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因此，我们对此地作了深入考察与研究，结果发现，民间口传与文献记载、方志碑刻以及考古发现，惊人的一致，这便引起了我们对于太行山地区与传说中神农氏关系的思考。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首先作一交代：古史上有两个神农氏，一个是代表着农业发生时代的神农氏，一个是走向宗教神权时代的炎帝神农氏。这两个神农的资料被历代的史学家混在一起，难以别择，所以我这里所说的神农氏，包括了神农氏与炎帝神农氏。这两个神农氏是同一个群体的两个不同阶段？还是神农氏与炎帝族融合而出现的炎帝神农氏？今已不好确定。但不管怎样，即使炎帝确属别一支进入了神农氏集团，他们间仍然有一种继承关系，而且其重叠在同一地区。以下的论述便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一、先秦文献关于神农氏活动方位的记载

先秦文献中涉及神农炎帝活动方位的记载非常少见。去其重

复，共有六则。大约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言及其活动地域者，二是间接反映其活动地域者。

直接言及神农氏活动方位者有三则，分别见于《国语》、《管子》、《山海经》。这三则，全部与太行、太岳之野有关。而其中《国语》“姜水”的一则，最为重要，惜长期以来被人误解，需要首先澄清。《国语·晋语四》说：

昔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韦昭注：“济”当为“挤”。挤，灭也。传曰“黄帝战于阪泉”是也）。

《世本·氏姓篇》也说：“姜氏，炎帝生于姜水，因氏焉。”姜水何在？《国语》中没有说明，郦道元《水经·渭水注》则曰：

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1]

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对姜水做出解释的文字。郦氏是一位优秀的地理学家，他的观点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故而在史学界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像《明一统志》、顾炎武《肇域志》、《清一统志》、雍正《陕西通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皆从其说。但是，据郦氏所言，姜水本来是叫岐水的，是因为东流经过姜氏城，才有了姜水之名的。而《国语》的意思是：先有姜水名，后有姜氏姓。《水经注》与《国语》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同时郦氏所记地理方位也与其

地地理不合，姜氏城并不在岐水岸边，故民国《宝鸡县志》卷十三于“姜氏城”下注说：“郦氏不考，以岐水蒙姜水之名，而并移姜氏城以就之。误矣！”此外，众多学者受郦道元的影响，虽不以其说为然，而却把姜水定位于宝鸡周边地区。如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以姜水为岐山县南三十里的姜泉；乾隆《重修凤翔府志》卷一，以姜水为宝鸡县之清江水；嘉庆《扶风县志》卷八曰，以为即扶风县之美阳河；今人李仲操撰《姜水辨》，以为即扶风县的畤沟河^[2]；刘宏斌撰《岐水、姜水与姜氏城》，以为即今岐山徐家河以东的后河或沛河^[3]；刘起釪则认为，羌、姜二字古同，姜水即陇西之羌水^[4]；章太炎先生《检论·序种姓》受文化西来说的影响，提出了姜水即蒲昌海（即今罗布泊）说。

就目前所知，所有的关于姜水的考证，几乎都指向了西部，而且都没有直接的证明，所用资料全见于西汉以降，而却忽略了古上党地区太行山中还有一条更为古老的姜水，而且是见于先秦文献的唯一一条姜水。《山海经·北次三经》曰：

又北三百里曰陆山，多美玉。鄭出焉，而东流注于河
(郭璞注：或作鄖水)。

这是见于记载最早的鄖水，它比《水经注》的记载最少也早了七八百年。而且从郭璞“或作鄖水”的注释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它与炎帝族的联系。字从“姜”、从“炎”，正照应着“姜姓”“炎帝”，而旁加“阝”，正是古氏族活动遗留地名的说明。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国语》中的“炎帝以姜水成”的姜水，不在陕西宝鸡，而是《山海经》中的鄖水。《山海经》中明确记载，鄖水是在以“太行之山”为“之首”的群山中，它的发源地是陆山，它的流向是东流入黄河。这

与同处一经、发源于发鸠之山的漳水相同。虽然我们不能确指其为今之何山何水，但它在太行山的周围却是可以肯定的。

其次是《管子》中的一则记载。《管子·轻重戊》曰：

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

这条资料，殊为可贵，这是目前发现的先秦文献中唯一一条明確记载神农发明五谷之地的资料。关于淇山，吕思勉先生认为即许由隐居的箕山，是姜姓由东迁往西方后才产生的传说^[5]。吕先生没有举出任何证据来，此说也看不出有任何道理来，故不可从。考古籍中淇山约有两处，一在山东，嘉庆《山东通志》卷六曰：“淇山，在安丘县南六十里，近淇河。”《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五下也曾言及此山，谓“旁有淇河”。显然这是因在淇河之畔，故才被称为淇山的。其见于记载也甚晚。一在太行山中。即淇水发源之山。《清一统志》卷一百五十八云：“淇山，在辉县西北，淇水所出。一名沮洳山，亦名大号山……按：淇水之源，《水经》云出淇山，《汉志》云出共山，《地形志》又云王莽岭源河流为淇。大约诸山相近，故各指而言之也。”考淇水发源于今陵川县境东北冶头乡附近的群山中，东北横穿壶关县，从河南林县注入卫河。淇山、沮洳山、大号山当指这里的群山。因为其地在共县（今河南辉县）的北面，所以《汉书·地理志》说出共北山。地又处林州西，故《淮南子·地形训》高诱又说在临虑西。隆虑、临虑一声之转，即今之林州市。这一带山峰以王莽岭最著，为太行山主峰，所以《魏书·地形志》又说：“有王莽岭源河东流为淇。”有一点我们需要说明，古代因地广人稀，因此在地理概念上也没有今之精确。往往一个地名，其所指范围甚广。

就《管子》所说的“淇山之阳”的概念而言，应该是指包括陵川、高平、辉县、林州等地在内的太行之野的广大地区，甚至比这更广，不能局限在一个点上。

与《国语》和《管子》中的两则不同，《山海经》中的一则，是记载炎帝少女活动的。《山海经》及先秦其他典籍中都有关于炎帝后裔活动的记载，但因去炎帝时代已久，不能反映早期炎帝族的生活地域，故暂不论及。《山海经·北次三经》云：

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

一般说来，凡言“孙”或“后”者，去其世皆远。凡言“子”或“女”者，则去其世近。所谓“炎帝之少女”，显然其去炎帝世甚近。而其未嫁而卒的传说，更说明了她尝为炎帝族中的成员，并未分离出来。因此她的活动地域，就应当是炎帝族的活动地域。这则记载中明确地指出了其活动的地理方位就在发鸠山。郭璞在注中也明确地说：“今在上党郡长子县西。”《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皆言：“发鸠山，在县（长子）西南六十五里，浊漳水出焉。”《山海经》所记载的诸山，因年代久远，地理变迁，往往在方位的落实上各家出现不同程度的分歧。但对发鸠山的指认上，则不见异说。其地属太岳山支脉，在太行、太岳之间。

此外还有一则资料见于《左传》。《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说：“姜，大岳之后也。”“大岳”即太岳。这一条记载，把太岳山与炎帝联系在了一起。众所周知，姜姓出自炎帝，而此言姜为太岳之后，显然是说炎帝与太岳本来就是一体的。太岳山为太行支脉。知其所指地域仍不出太行、太岳之野。关于这一点，在下文还要论及，

此不赘述。

在先秦文献中，间接反映炎帝族活动方位的记载也有三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炎帝族相邻的方国，二是与炎帝有婚姻关系的方国。与炎帝有婚姻关系的有一则，见于《山海经·海内经》，其云：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

这一则记载，问题较多。主要是文字的讹误。《太平御览》卷一三五引《帝王世纪》谓炎帝娶“莽水氏之女”。司马贞《补三皇本纪》谓：“神农纳奔水氏之女”。郑樵《通志》卷一作“莽水氏之女”，《路史》卷十三《禅通纪》则曰：“神农取承桑氏，一曰桑水。陕之灵宝有桑里亭（注：晋桑田，今郎陵有桑里）。”所言各异，但有一点我们比较相信，无论是皇甫谧，还是司马贞、郑樵、罗泌，他们都当有所依据，不可能是随意编造。赤、桑、莽、莽、奔字形略相近。就一般规律而言，人们有可能把一种陌生的名称，根据自己的理解转为自己熟悉的名称；不可能把熟悉的名称误成陌生的名称。“赤水”一名频见于古籍，为人所共知，因此赤水误为桑水、莽水、奔水的可能性不大。值得考虑的是桑水、莽水之说。特别是莽水，不见于古籍，人最感陌生。“莽”字又或书作“莽”，即莽字，最易误为“奔”。罗泌父子以为“莽水氏”当作“桑水氏”，指定其在河南省灵宝县，这只是一种可能，而我感到，从字形分析，莽、奔、赤更相近，奔水、赤水当是莽水之误。“桑水”之说，只见于罗氏父子的著作中，而诸家则多作奔水、莽水或莽水。

关于莽水所在，不见于古籍。在山西阳城县城南约四十里有

一条河叫莽河，有山叫莽山。雍正《山西通志》卷二十三《山川》云：“莽山，在（阳城）县东南四十里。”莽河在莽山下，见《阳城县志》。笔者在阳城考察时发现，这里保存的古地名相当多，如山有析城、砥柱、嵯峨、崦山等，水有濩泽、桑林等，村有高阳、阳陵、演礼、阳邑等。有些名字传说尚存，如：桑林，相传即成汤祷雨之地；天子嶂，传说周穆天子曾驻于此；驾岭，周穆王驾过此岭；董封，相传晋国董安于此食邑；屯城，战国白起屯粮于此等。有些则见于故书记载，如析城、砥柱，见于《禹贡》；濩泽见于《竹书纪年》、《汉书·地理志》等。有些则传说已失，记载无存，如上甲、下甲、侯甲、武甲之类名，不下几十处，为什么要叫甲？人已不知。像高阳、侯井、旃村、阳陵等，虽当地人也有解释，但显然附会为多。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莽河也当是保存的一个古老名字，从其书无定字（莽或书作漭）的情况看，也可以看出人们为解释这个古老的名字所作的努力。其是否与神农氏所取莽水氏之女的传说有关呢？我们则不敢说定。但值得注意的是，莽河边有一座古老的黄龙庙，父老传言：庙中所祭祀的是轩辕。至于轩辕是谁，则不知道。对此我感到非常惊奇。因为轩辕即黄帝，在汉族活动的地区，黄帝是一位远古的圣王，也是祖先。至于说黄帝是黄龙的传说，除了有关天文学的著作中有“轩辕黄龙体”类记述外，在历史记载与汉族传说中，几乎已很难找到痕迹。只有在苗族传说中，黄帝被称为黄龙公。而这样一个长期被汉族人所忘记的古老历史，竟然在这个极为偏僻的山谷中保存了下来。从文献记载中看，炎、黄两族长期存在着婚姻关系，“莽水氏之女”有无可能属黄帝族呢？若真如此，则莽水当是莽河了。

关于炎帝邻国的记载有两则，即：

《吕氏春秋·用民》：“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

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

《战国策·秦策一》：“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

夙沙，《路史·禅通纪》作质沙，云：“帝魁之立，祇修自勤。质沙氏始叛……质沙之民自攻其主以归。”罗莘注曰：“质沙，炎帝时侯者也。《世本》、《世纪》皆作夙沙……《世本》、《唐韵》等言夙沙氏煮海为盐，以为炎帝之诸侯。今安邑东南十里有盐宗庙，吕枕云：宿沙氏煮盐之神，谓之盐宗，尊之也。”夙沙其地当在今山西南部运城盐池附近。看来这是运城附近一个以盐业为生的族群。

关于补遂，是指补与遂二国。《路史·国名记》云：“补，炎帝伐补遂，史伯云：邬、蔽、丹是也。《姓苑》有补氏，《通典》作辅遂，非。”“史伯云”者，是指《国语·郑语》记史伯对郑桓公的一段话。郑桓公为周司徒，在周室多故之秋，他请教史伯选择什么地方，才能使灾难不及于自己。使伯告诉他最好是选择济、洛、河、颍之间。因为此地当时最大的国是虢和郐，这两个国的国君皆恃地势之利，不修其德。若果到这里，借故把虢、郐拿下，像邬、蔽、补、丹等八个小国，就全属于你了。由此看来，补当是春秋时郑国的地盘了。此地今虽无考，但大略可知其在今郑州附近，是太行八陉之一的太行陉通向的地方。距太行山约百余里。

关于遂，《路史·国名记》曰：“遂，炎帝伐之，易之遂城，古武遂也。妫姬皆有遂。”所谓“易之遂城”是指易州的遂城，战国时的武遂。《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二易州下有遂城县，《清一统志》卷十一云：“遂城故城，在安肃县西，战国时燕之武遂也。《史记》赵悼襄王二年，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按：其地在今河北徐水附近。在太

行之东,是太行第七陉所通向的地方,距太行山约百余里。

通过以上的考证,我们发现,在先秦文献中无论是神农氏,还是与神农氏发生过关系的方国,基本都在太行山内及其周边地区。这说明,太行山地区应当就是神农氏的老家。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炎帝族发祥于陕西。但是在先秦文献中,却找不到一点线索。即便有人通过考证,获取一些有关炎帝在陕西的信息,那也只是一种可能性推测,明确的记载则一条也找不到。甚至关于羌人最早活动于西部而后向东迁徙的理论,也是一种假说。历史学界大多认为,炎帝姜姓,是羌人的一支,最早活动于西北,后来才迁往中土的。根据是:先秦及秦汉以降的文献中,关于羌人活动最集中的就在西北甘、青地区。于是西北便被认定为羌人的大本营。但是这一说法,我们在先秦文献中却找不到任何根据,而看到的却是炎帝之裔在公元前二千多年被迁往西北的记载。《左传·襄公十四年》中有来自西北的姜戎,他们自称是四岳之裔。四岳,《左传》中又书作太岳,而太岳山就在山西中部,为太行支脉。《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十一引《四夷传》亦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其先为伯夷甫,炎帝之裔。”而《尚书·舜典》又明确地提到,三苗是被舜放逐于三危的,三危就在现在的甘肃北部。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不相信《尚书》的记载,认为这不合逻辑。可是要知道,历史是靠记载传播的,而不是靠逻辑推导出来的。我们不应该因为用现在人的观念无法解释而就予以否定。

二、汉唐以降文献记载对“神农氏太行说”的支持

我们在对先秦文献的检索中,已经清楚地看到了神农氏活动

区域之所在。为了进一步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从汉唐以降的文献中,作进一步取证。需要说明一点,汉唐以降文献中关于上古史的信息,相当多是对早期民间口传史的记述。特别有一部分得自道书,而道家者流,据《汉书·艺文志》所言,出自古之史官,故有一部分上古史的信息在他们的著述中保存了下来。像庄子在《胠箧》篇中一口气就列举了一长串古氏族的名字,这些名字由何而来,很难知晓,有可能得自学派内部的师传。也有一部分是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虽然其可信度与先秦文献相比,需大打折扣,但毕竟不失参考价值。在宋代,不止一人对上古史做综合工作,把来自各方面的古史资料综合分析,归纳、串联,构制出了新的古史系统。因为他们缺乏科学精神,自然在现代人看来,大多为无稽之谈,但他们的综合,却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上古史信息。使我们有机会面对这些资料作进一步的分析。

在汉唐以降的文献中,关于炎帝神农氏的记载最受人关注的是他的一连串的别号。列山氏(或作烈山氏)、连山氏、伊耆氏、大庭氏、魁隗氏等。我们认为,这些别号,绝非向壁臆造,应当是有史料作为根据的,可以看作是神农氏集团中成员之名。

首先看伊耆氏。《路史·禅通纪》言:“炎帝神农氏,姓伊耆。”刘恕、郑樵等又说神农一曰伊耆氏,或书伊祁氏。这个名称可能尧时还存在,故古史有“伊耆之国尧之母家”的传说。伊耆氏之名,曾见于《周礼》、《礼记》。在《周礼·秋官》中,是作为职官名出现的。郑玄注说:“伊耆,古王者号,始为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齿杖,后王识伊耆氏之旧德,而以名官与?”^[6]《礼记·郊特性》郑注:“伊耆氏,古天子号也……先啬,若神农者。”孔颖达疏说:“则伊耆氏,神农也。”罗泌《路史·禅通纪》进而说,神农“其初国伊,继国耆,故氏伊耆。”罗苹注说:“伊即伊尹之邦,耆即文王之所伐者,犹陶唐

然。”所谓“犹陶唐然”，是因为古人认为陶唐的得名也是如此。如《汉书·高帝纪》注：“臣瓒曰：尧初居于唐，后居陶，故曰陶唐也。”《路史·国名记》于“炎帝后姜姓国”下云：“伊，盖亦上世所国。今洛之伊阳县有伊水，尧之母家伊侯国。耆，侯爵，自伊徙耆，爰曰伊耆，一曰仉，黎也。故《大传》作‘西伯戡耆’，《史记》言文王伐仉。”罗氏父子认为伊、耆为二国，并以为与陶、唐本为二国同。《路史·疏仡纪》“陶唐氏”下注说：“韦昭书云：陶、唐皆国名，犹殷、商然。”这一说法缺少上古史的根据。窃以为上古人类尚处于童年时期，其语言发音比今人缓慢，就像儿童说话一样，如小孩叫爸为“爸爸”、妈为“妈妈”、豆为“豆豆”、狗为“狗狗”之类，皆音缓而然。记载汉语口语最早的文献当数《诗经》，《诗经》中双声、叠韵词如采采、苍苍、纠纠、夭夭、参差、婆娑、委蛇之类的大量出现，即可以说明这一点。叶舒宪先生把汉语中大量双声叠韵词认作是内化到“成人语”中的“婴儿语”^[7]，这未尝没有道理。传说中的原始氏族每以双声或叠韵为称，当就是“婴儿语”的一种形态。如《庄子·胠箧》篇中有栗陆氏、容成氏、大庭氏、赫胥氏、祝融氏、骊姬氏等，见于其他典籍者有泠沦氏、台骀、陆终、侨极、夙沙、陶唐等，这些名称，不是双声，便是叠韵。孔颖达似乎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说：“陶唐二字，或共为地名。”^[8]早期见于记载的氏族部落，因文字书写艰难，力求省简，故而把口头上的双音词用单词来表示。如陈梦家先生《殷虚卜辞综述》中，共列商代国名近五十个，像土方、邛方、鬼方、亘方，以及周、犬、郭、旨等等，全部都是单字，没有一个是由双音词表示的。这绝对不是因为当时国名清一色的全部是单音名。而春秋战国时因书写工具的发达，故对口传中的古代氏族名称，能较完整地记述下来。像“伊耆”之名即是如此。“伊耆”二字皆在脂部，为叠韵，急言之可谓“伊”，亦可为“耆”。罗氏父子以为耆即西

伯所伐之耆，这一观点是值得肯定的。“西伯戡耆”，《尚书》作“西伯戡黎”。耆、黎古皆在脂部，音近相通。《周本纪》“明年败耆国”，《正义》引邹诞云：“本或作黎。”孔传以为黎“在上党东北”。孔颖达曰：“黎国，汉之上党郡，壶关所治黎亭是也。”^[9]

在甲骨文中我们也曾见到了关于黎方的记载。其字隶定为匚、召。陈梦家先生认为是农具的象形，与“耒”、“利”等字读为舌边声。如此说来，这个方国的命名，是与其从事农业生产相联系的了。这一点我们还可从黎、利诸字的形义中得到证明。徐中舒先生《耒耜考》云：“利所从之匚、匚诸形，即力形之变，像用末端刺田起土之形。铜器将力旁移于禾旁，故小篆利或从刀，但古文利，及从利之黎、梨、犁诸字，仍是从匚，可证从刀乃是省形。利，来母字，自是从力得声。刺地艺禾，故得利义。”^[10]吴楚《释黎》云：“黎从匚黍，匚古文利，利者禾既成而以刀刈之，民食所资，其利大矣。黎复加黍，因重禾而省其一，仍从匚为声。夫禾固嘉谷，黍亦禾属而黏者也。禾黍并成而刈获，则其利更大而且众矣。此黎义之所以言众也。经传中称黎民者，固取其众，亦取其上者能重民食以养民之意。”^[11]

诸家之说，虽有出入，但都把利、黎与农业联系起来，这一点则是一致的。特别是吴楚对从禾从黍省之说，最为精确。禾为稷，即小米；黍为黄米，黍稷正是启动华夏文明的食物支撑。“黎”之音、义，并受之于“利”，因禾得利，因名其地曰黎、其族曰黎，音变为伊、耆。陈梦家先生又考证黎之所在说：“卜辞的匚或召，可能是黎国之黎。《说文》曰‘釐，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从邑匚声，匚古利字；《商书》西伯戡釐。’《汉书·地理志》上党郡（治长子）壶关引：‘应劭曰黎侯国也，今黎亭是。’《续汉书·郡国志》上党郡壶关‘有黎亭，故黎国’，注：‘文王戡黎即此也。’”^[12]这一解释大致是对的。光绪《山西通志》卷五十《古迹考一》曰：“黎，《史记·殷本纪》